

KAIPÍ SHEHUIZHUYI

WENYI·FANRONG·DE·XINSHIQI

开辟社会主义文艺 繁荣的新时期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I200/6



开辟社会主义文艺 繁荣的新时期

中国文联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
中国文联文艺理论部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·一九八〇年·成都

本书收集了中国文学
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
会暨文学艺术界各协会代
表大会的部分发言。

目 录

- 1 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第
二次代表大会上的
讲话……………夏 衍
- 16 解放思想 团结向前
……………魏 巍
- 28 创作要上去，关键在
领导……………延泽民
- 34 繁荣文艺创作必须
解放思想……………于黑丁
- 43 繁荣文艺必须肃清
封建流毒……………艾 芜
- 48 我们的责任……………王 蒙
- 54 为新诗和文艺队伍说
几句话……………柯 岩
- 71 对文艺工作的几点
意见……………陈登科
- 85 时代的召唤……………刘宾雁
- 106 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
……………白 桦

- 118 从生活谈起……………马 加
- 123 再谈革命的现实主义
……………康 濯
- 143 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和
政治……………韶 华 思 基
- 157 关于艺术规律的探讨
……………万里云
- 191 大胆表现革命的人
性美……………王愿坚
- 195 文学与科学……………徐 迟
- 206 大力发展和繁荣少数
民族文学事业……………仁 钦
- 222 西藏解放以来文学发
展概况……………汪承栋
- 228 总结经验,解放思想,
让外国文学之花开
得更加鲜艳……………叶水夫
- 247 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
高到新的水平……………钟敬文
- 267 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
……………马学良 王 尧
- 281 劳动的歌声 历史的
镜子……………李根宝
- 292 新故事的沿革、现状
及其他……………魏同贤

- 306 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
戏曲剧目工作……张 庚
- 332 社会主义话剧大步
前进……吴 雪
- 345 恢复和发展我国话剧
表、导演艺术的现
实主义传统……金 山
- 372 艺术教育是党的重要
事业……李 超
- 386 人气、仙气、志气……黄佐临
- 400 歌剧三题……晏 甬
- 405 认真总结经验 繁荣
戏剧创作
……沈西蒙 胡 可
- 416 大力奖掖后进，提倡
“大器早成”……常香玉
- 423 藏戏艺术的第二次
解放……阿玛次仁
- 430 关于音乐教育的几个
问题……赵 凤
- 435 解放思想，唱出人民
的心声……高 叶
- 441 一个有待开发的宝库
……郭乃安
- 455 要提高歌词的创作

- 水平……………晓 星
- 462 三十年来民族器乐的
发展……………秦鹏章
- 475 牢记周总理教导 为
人民多编多唱……………姜秀珍
- 483 关于目前台湾音乐工
作的几点看法
……………魏 立 王碧云
- 490 关于国画问题的一封
信……………江 丰
- 495 从安徽美术创作的情
况看政治和艺术的
关系……………张法根
- 502 我的感想和希望……………吴冠中
- 505 “奔向十字街头” ……许 勇
- 512 曲艺艺术发展中的
几个问题……………陶 钝
- 522 抢救遗产，为繁荣曲
艺艺术贡献力量……………何红玉
- 528 献给我们时代的舞
蹈家……………胡果刚
- 543 我对杂技艺术的看法
和建议……………阿 良
- 549 业余摄影爱好者要尽
可能地努力为四个

	现代化建设服务……黄翔
554	深入生活，繁荣民族 摄影创作……吉雅
559	自卫还击战中的摄影 体会……李永安
569	香港文艺活动的国际性……何达

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

由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干扰破坏，我们电影工作者已有十九年没有开过这样的大会了。现在大家欢聚一堂，这当然是很高兴的，但也不能不为我们电影工作者协会的主席蔡楚生、副主席田方，以及郑君里、应云卫、孙师毅、孟君谋、上官云珠……等许多同志遭受迫害、含冤逝世，而感到难过。他们今天已经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共商大事了，这是中国自有电影以来的一场空前浩劫。为了使电影工作能够大步前进，回顾和总结一下电影工作的经验，是十分必要的。

政治与艺术的关系

周扬同志在报告中讲到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。对这个问题，我想了很久。其所以成为一个问题，是由于历史条件、社会条件造成的。中国电影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，到现在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，党领导电影也有四十多年了。其间有成功的取得胜利的经验，也遭受过惨痛的挫折。

我参加电影工作是在一九三二年，最早和我一起搞电影的田汉、阿英、郑伯奇、王尘无等同志，都已经去世了。早年参加电影小组的，现在只剩下我、司徒慧敏、石凌鹤同志。回想一九三二年，在苏联以及日本这些国家中，正是左翼全盛时期，我国先是立三路线，后是王明路线。我们最早提出无产阶级文学口号的“左联”，受苏联“拉普”（即“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”）的影响，本身就带有“左”的色彩，并不注意统一战线工作。中间的、右的都不包括在内。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，把左翼文艺工作者联合起来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，是完全必要的。但是由于“左”的思想作祟，对政治和艺术怎么摆法，根本未加考虑。当明星影片公司请我和阿英、郑伯奇去当顾问的时候，我们请示过党中央当时在上海领导文化工作的瞿秋白同志。他最初持怀疑态度。因为当时电影界拍的多是《火烧红莲寺》以及所谓伦理片、爱情片等等，在电影工作者中间，吸鸦片、生活腐化的现象也很普遍，没有革命的火种。后来他想了一想，同意了，但给我们指示两点：一、不要与电影界腐化势力同流合污；二、在目前情况下，不可能拍出我们想拍的影片，但应于条件许可时，在资本家拍的影片中加一点进步的、爱国的内容，还要注意团结一批爱国的电影工作者。我们在明星公司只有三年多，无论是自己编写剧本还是帮助别人修改剧本，都要千方百计地将进步的、爱国的思想掺进去，在他们的艺术片中加进一些革命的对白，在无声片里加上这种内容的字幕。我们最早就是这样处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的。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，我认为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，也是无可非议的。那时，正在“一·二八”抗战之后，广大人民群

众要求抗日，而国民党政府却残民以逞，实行“先安内后攘外”的政策。所以，任何一部影片中出现一句爱国、反日的话，就会博得观众的掌声。但是，把这种特定条件下的应急手段固定下来，把“政治”和作者的世界观、作品的情节与人物分开，认为任何一部影片都可以象厨师在菜肴里加一点茴香、辣椒之类的作料一样，那就不足为法了，正如鲁迅先生在一篇杂文中曾经嘲笑过的“剖西瓜”也要使人想起“瓜分”一样。我想，这就是解放后的政治与艺术关系处理不当的根源。所谓“但求政治无过，不求艺术有功”，也和这一历史事实有点关系。抗战开始，上海电影界的同志多数到大后方参加抗敌演剧队，用话剧形式对敌人进行斗争。八年抗战期间，国民党没拍过一部象样的影片。抗战胜利后，电影工作者又集聚起来，组织了进步的崑崙影片公司，蔡楚生、史东山、孙瑜、郑君里、陈鲤庭、白杨、赵丹等同志都参加了。

这一段时期，由于国民党忙于接管，还没有搞出一套把电影完全控制起来的办法，我们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就抓紧时间拍摄了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、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、《万家灯火》、《乌鸦与麻雀》和《松花江上》等较好的影片。这些影片很受群众欢迎。而国民党只不过拍了《十三号凶宅》那样的片子。那正是全面内战开始前后的时期，这些影片都可以说是为政治服务的，从属于政治的。

最近有位领导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提出，文艺为政治服务，文艺从属于政治，这种提法值得考虑。因为马、恩、列、斯没有这样讲过，西方世界也没有这种说法。中国古来也只是说“文以载道”，而没有说过“文以载政”。在我们的实践中，这些口号

确也出过不少偏差。我听了这位同志的讲话，很震动，想了一夜，没有睡好。因为我们提惯了文艺为政治服务，政治第一、艺术第二，而且还加上“尽可能完美”，意思是差一点也可以。的确，有些东西是不能从属于政治的，如花鸟山水画。人民大会堂有几百幅画，有几幅是为政治服务的？有些音乐作品，很抽象，却能陶冶人的性情。有些山水诗、抒情诗与政治关系不大。古代李白、杜甫的诗，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，反映了当时的政治，杜甫的诗更是如此。但从数量上来看，他们大多数的诗，还是与政治无关的。当然，作家的世界观是与政治有关系的。所以说，文艺为政治服务，文艺从属于政治，这样的提法值得研究、讨论。我们的文艺沿用这个口号，加上那个“理论权威”以及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等一伙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干扰，我们很容易接受这一类偏“左”的口号。后来又层层加码，变成政治服务、为当前政治服务、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服务、为当前的中心工作服务，一直到具体化为“写中心、画中心、唱中心”等等，这许许多多的提法和做法，是“四人帮”之前就形成的一种习惯势力。在几次大的政治运动中，作家不是写自己熟悉的、感人的、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，而是匆匆忙忙拿着上级的指示下去，了解到一些表面情况就回来写戏，配合中心运动，花费了大量无效劳动。由于十七年中充满重大政治变化，上头一提出什么口号、任务，你就去反映，必然发生许多问题。比如说，中国的农业合作化，是毛主席吸取了苏联的惨痛教训，采取稳妥办法搞起来的，因此我们的合作化速度快，未引起生产下降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但是从土地改革、互助合作，一直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化，这是一个迅速变化的过程，其

间的政策变化很多。在很短时间内写成的作品，一两年后，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，有时就会因为违反政策而停拍或停映。比如大跃进时期，农村大办合作食堂，现在听起来是笑话，当时把一些农家的锅碗都砸了。上影厂有部故事片叫《李双双》，其中有个情节是写农村办合作食堂的，片子拍到一半，就听说中央已改变政策，农村除了农忙时期外，不办合作食堂，平常各家各户还是回家做饭。这一下片子只好停下来。后来作者提出来和我商量，说他主要是要写解放妇女劳动力，办食堂只是一个情节，把这个情节改一下，片子还是可以继续拍的。我说可以，后来影片改成修水利，才拍完放映了。

紧密配合当前重大政治任务这个口号，当时我们听得进，执行起来也很卖力，但效果却是不佳的。对于作家来说，是十分有害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列宁的话说得对。高尔基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六日写给娜·康·克鲁普斯卡娅的一封信中，曾经提到十月革命前他在卡普里岛和列宁的一次谈话。高尔基回忆说：我本来也幻想写一个家庭的百年史，从一八一三年莫斯科重建开始直到我们今天。这个家庭的祖先是农民，是一个由于在一八一二年立下战功而被地主解放的村长，从这个家庭出身的有：官吏、神父、工厂主、彼得拉舍夫斯基派、涅恰耶夫分子和七十、八十年代的革命分子。列宁非常注意地听着，提了些问题，随后说：“主题非常好，当然，是一个难处理的主题，需要大量的时间，我想，您是能够胜任的，不过我看不到书的结局如何！现实是不会提供什么结局的，这要等革命成功以后才能写，目前只能写类似《母亲》那样的东西。书的结局，自然，连我自己也不曾看到……。”（《列宁论文学艺术》第二

卷878页)列宁这一段话,很值得我们仔细学习。当“现实是不会提供什么结局”的时候,即使象高尔基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,要以这个题材来写一部长篇,还是有困难的。一九六二年我把这些话写成文章,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、歌剧、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作了书面发言。当时我认为大的政治变革用某种文艺形式是可以迅速反映的,写些诗,画些画,编些相声,作些歌曲,是可以的。但要用电影、长篇小说这样的重武器来表现,就有些困难,应该过一段时间再写。对这个问题,文化大革命中给我戴了一顶“距离论”的帽子,我至今认为距离还是需要的。新中国成立已经三十年了。象三大战役、解放大西南、抗美援朝等等都有了结论,可以写。对于人民公社,也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。大家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,许多问题已经很清楚,也都可以写。现在不是有把文艺分成“向前看”、“向后看”这样的奇怪说法吗?所谓“伤痕文学”、“暴露文学”等“向后看文艺”,如《班主任》、《伤痕》、《窗口》等等,之所以显得那样真实感人,都是由于写了作者亲身经历的、非常熟悉而又值得反映的生活斗争的缘故。当前反映我国“四化”的作品怎么写?我想象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、《报春花》、《未来在召唤》那样的作品,可以搞。因为它们是为“四化”开辟道路,扫清障碍的,是批判官僚主义、思想僵化、为了保乌纱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那种人的。至于正面反映“四化”的大型作品,目前就先要从积累材料做起,到各地看看,要过一段时间才好写。我不怕戴“距离论”的帽子,这个距离看来还是要有一点的。我过去在领导岗位上呆久了,有个喜欢“出题作文”的毛病。我曾在一次电影厂长会议上建议,上海宝山正在

建设大型钢铁厂，希望上影厂有人隔一段时间下去看看，以便了解全过程。现在宝钢建设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，也许我的话又说早了。不过积累材料还是需要的。等到以后出了钢，生产稳定了，经验教训也清楚了，再动笔来写就比较办好。

题材问题，实质上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。胡耀邦同志讲话和周扬同志报告中都提出，现在不是思想解放过了头，而是解放得很不够。辛亥革命时，我才十一岁，当时人们要剪掉辫子，就有思想斗争。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中一下子解放出来，是不易办到的。粉碎“四人帮”才三年，说思想已经很解放了，这不符合实际。马克思主义并未终结真理，还在发展过程之中。马克思、恩格斯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要在工业发达、产业工人多的国家首先发动，而且必须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起来闹革命，革命才能胜利。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，结合俄罗斯的实际情况，认为革命也可以在工业不很发达、贫穷落后、农民众多的国家，首先取得胜利。我国的王明“左倾”路线时期，也搞过城市暴动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，结果失败了。毛主席又发展了马列主义，认为在中国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，只有走乡村包围城市，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，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。列宁和毛主席的论断都已为实践所证明，你能说他们是“砍旗”吗？他们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。有人曾经问过毛主席：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？毛主席说当然可以，如果马列主义可以批评得倒，这个马列主义也就证明不行了。怕批评的绝不是真理。马克思的学说，总是我们的祖师爷了吧，尚且可以讨论，尚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发展，我们为什么要相信“句

句是真理”，非要搞本本主义不可呢？搞本本主义本来就是反马列主义的。毛主席讲过的话，情况变了，有必要是可以修改的。

文化大革命教育了我，吃了点苦头，也学到了一点东西。我敢于这么讲，毛主席讲过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也可以发展。说“句句是真理”，那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阴谋。比如我讲过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，不是不要，但那是三十多年前在陕甘宁边区提出来的，当时从大后方去延安的文艺工作者，是有一个熟悉和了解边区的工农兵群众，然后才有可能正确表现他们的问题。当时毛主席也讲过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。过了几十年，情况变化了。过去的农民大多数是文盲，现在农民中不仅有中学生，还有大学生。工人中间，解放初期文盲很多，现在就不同了，工人中不仅有中学生、大学生、工人工程师，而且还出现了工人作家。有几本好小说，就是工人写的。我在广播中听到的《乔厂长上任记》，作者就是工人，他非常熟悉生活，善于表现生活。现在我国阶级关系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，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，民族资产阶级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人。地富的帽子也摘了，大多数人是好的。因此，可以说文艺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，或者直接提文艺为人民服务。我还讲过六条标准毛主席讲话时没有，是反右开始后以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为题目发表时加上的。这六条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，有些提法不够科学，有些界限不易划分清楚。坚持六条标准对贯彻“双百”方针不利。我反对“在六条标准的前提下执行双百方针”这种提法。有了六条就很难贯彻“双百方针”。现在，中央许多精神还不容易贯彻

下去，甚至连按劳取酬、多劳多得的指示，都难以贯彻，主要由于受到了既得利益者、官僚主义、特权思想等等的阻碍。如果好好写一个反官僚主义的电影，应当会有利于“四化”建设，但是有人又会说它是打击老干部，丑化社会主义，违反六条标准，你怎么办？有一位科学家对我说，我们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比你们的好搞些，可以用数字、电子计算机来验算，你们的作品就可能其说不一，莫衷一是。我们不一定反对这六条，但是至少可以不用它来衡量文艺作品，这不能说是“砍旗”。

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问题，周扬同志报告和茅盾同志讲话说法就不一样，这些问题都可以自由探讨。通过百家争鸣，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检验，以后总会愈辩愈明的。现在，历史发展非常之快，《封神榜》、《西游记》上写的东西，很多已经变成现实。美国太空人六次登上月球表面，证明月亮是一片黑暗，上面没有空气，没有生命。这就把“嫦娥奔月”之类的神话传说全部否定了。马克思说，神话有永久的艺术魅力，但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就有可能否定神话本身。为什么书本上写过的话，马、恩、列、斯、讲过的话，就不能改？华主席和邓小平同志都讲要实行“三不”主义，胡耀邦同志也讲过今后不会再搞反右那样的运动来整文艺工作者了。长期以来，电影象个小孩子，大家都来管，受到“横加干涉”的情况是很多的。所以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、国务院向文代会致的《祝辞》中讲到今后不应文艺“横加干涉”的话时，大家都长时间地热烈鼓掌，衷心拥护。于伶同志在上海管过文化、电影方面的工作，吃过不少苦头，他深有体会地说过，电影好象几房得一子，各房都来管，这个怕凉着，